



1
2

弗洛伊德 著 文荣光 译

少女杜拉的故事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生的三阶段 (油画) [奥地利] 克里姆特 作

少女杜拉的故事

——一位歇斯底里
少女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著
文 荣 光 译

责任编辑：曼 瑞

装帧设计：周六炎

少女杜拉的故事

Shao nǚ du la de gu shi

弗洛伊德著 文荣光译

北方文丛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 印刷

中国和平出版社希望书店 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25

字数10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10360·107 定价：1.00元

曾序

“杜拉”是一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少女的名字。本书详细描述这位少女接受精神分析的内容及经过。在佛洛伊德所发表过的精神分析实际病例报告中，最值得阅读的，首先要推“杜拉”这篇了。因为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动态精神医学的各种重要学理，如潜意识的存在、心理自卫机转、心理症结等观念都起源于心理症（Neurosis）之研究，从而推广到其他精神疾患；而在各种心理症当中，又以本篇女主角“杜拉”所患的歇斯底里症为最早期的研究对象。所以要想研究、了解精神分析学说之来源与发展，首先应阅读这篇富有历史价值的病例报告——“杜拉”。再者，佛洛伊德所发现的“伊底帕斯症结”（Oedipus Complex），或者“三角关系症结”，在歇斯底里症患者发现得最明显，也是患者所困扰的问题。透过“杜拉”这病例，我们可以深切地了解伊底帕斯症结的真相。

所谓歇斯底里症（Hysteria）乃是一个人受到心理刺激与挫折之后，其不安之冲动，不以“情绪”表现出来，而是经由“转化作用”表现于身体上，造成感觉或运动系统之机

能性障碍；或者意识、记忆、人格等其他精神活动之部分障碍者称之。例如一个人与人吵架后，忽然“昏迷不醒”、“四肢抽痉”、或突然失声，不能讲话等，到心理刺激除去之后，这些症状也就马上消失。歇斯底里症（Hysteria）一字原为希腊文之“子宫”，因为在 Hippocrates 时代认为此症属于女人的毛病，与性有关系，认为是因为女人想男人想得太厉害，其子宫因而脱位，徘徊到身体其他部分而造成各种症状。当时认为患这种病的女子，只要一结婚，就可以霍然全愈。到了中古时代，随着宗教观念的影响，歇斯底里症就如同其他精神疾患一样，被解释为是因着魔而产生。到了十九世纪末，有名的神经医学家沙孝（Charcot），证明歇斯底里病人可以用催眠方式产生或除去其四肢麻痹或抽痉等身体症状。紧接着，佛洛伊德与患者详细会谈，研究其生活史，发现这种身体症状与患者所遭遇的心理困难有关连。把精神医学从器质性病因的观念带进了心因性的观念领域。从这点，可以说歇斯底里症是促进精神医学进展的一个重要踏脚石。

佛洛伊德在本篇所描述的“杜拉”，因每次遇到心理挫折就会产生咳嗽、嫌恶感、失声以及厌世感等症状，而被带来就医。经由精神分析的过程，佛洛伊德发现杜拉有着严重的心灵问题——未解决的伊底帕斯症结（或三角关系症结）。因为杜拉迷恋父亲，常与母亲作对，形成三角关系；杜拉既羡慕、又妒忌父亲的情人K女士，一面暗地里模仿她，一面又想从她手里把自己的父亲抢回来，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关系；而杜拉又拼命与K先生接近，与其妻对抗，又形成另一个三角关系。总之，杜拉在与人之关系，永远逃不了三角关系，充分表现出她的行为受到伊底帕斯症结之困扰。

精神分析家认为在人格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口欲期、肛门期、性蕾期、同性期、青春期等几个阶段。三岁至五岁之小孩在所谓性蕾期（Phallic stage），对男女之性别开始感兴趣，在“心一性”发展的过程中，是个萌芽时期，故称之为性蕾期。此阶段之小孩常对自己异性父母感到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三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害怕父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之伊底帕斯症结。在一般正常情况中，男孩子慢慢地转而与父亲接近，向父亲学习如何做个男人，而女孩子与母亲亲近，模仿母亲，学习如何成为女人，进入同性期，圆满解决此伊底帕斯症结。但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让性蕾期的小孩子无法顺利发展，例如，一个女孩子的父亲过份宠爱她，不让她与别的男孩子玩，或者母亲一直对待她不好，让女孩子无法与母亲接近，（男孩子则刚好是相反情况），则心一性发展无法顺利完成，留下未解决的症结。即使长大之后，仍然续继徘徊于三角关系之中，常常有意无意地结交有太太的先生，或者怀疑先生有女朋友，不停地闹着三角关系。而且由于性蕾期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她在心一性发展的过程中停滞下来，无法成熟，一方面很想与异性接近，但另一方面又很惧怕发生性的关系，显得很矛盾。本书所描述的杜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般说来，精神分析的病例很不容易描述。要把所有研究、分析、治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且完整地报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佛洛伊德总算把“杜拉”这位女病人的心灵症结很扼要地描述，一方面让我们了解歇斯底里的问题核心所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大略地体会到精神分析

的工作内容。这次文荣光君能运用他流畅的文笔把本书译出来，供大家阅读，对精神医学之推广实有莫大的贡献。

曾 炳 煜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

于台大医院精神科

黎氏序

黎氏 (Philip Rieff), 美国宾州大学社会教授, 系柯里尔从书中十本佛洛伊德著作集的编者, 是佛氏学说的权威学者之一。在此序中他讨论杜拉与佛氏的关系, 并对歇斯底里症和佛氏过人的机智有极吸引人的描写。

——译 者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 佛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柏林医生兼生物学家浮氏 (Wilhelm Fliess) 告诉他得到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快乐, 我有一个新病人,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 此病例已开启了智慧之门。”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佛氏给浮氏另一封信, 告以那个案结束, 病历已完成。“结果是我发觉自己需要吃点药。”那使他精疲力竭的, 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 这里称她为“杜拉”的病例。

当佛氏完成该病例时, 觉得这是未曾有的最复杂微妙的事。甚至复杂微妙到使人倒胃口, “比以往还厉害”; 佛氏对一般读者的忧虑比往常为多。他对群众的两面性态度极少消灭。在这病例中, 他已为后代建立一个极富价值的里程碑, 然却

因当时世俗对“自我”的束缚，使他担忧如何使这病例被人们接受。于是，他拖了好几年才出版。那年轻女子在一九〇〇年底停止治疗（佛氏有时记性欠佳，一九三三年他在自己的一项注释中确信该病例已于早先一年即一八九九年结束），佛氏就在其后一个月中撰写病历。他曾将手稿付梓，然随即索回，延至一九〇五年才出版。这种迟疑态度对一个有野心的作家而言，可能是对自己作品及读者水准缺乏信心的反映。显然地，佛洛伊德对自己作品具有信心，读者能力才是他所怀疑的。

如果我们承认艺术与科学能做好事的话，那么我们也得承认他们也能做坏事。一件艺术或科学成就的观赏者可能以低劣的态度接受它而腐化它。有其低劣的作品，必有其低劣的观众。佛氏深知他的作品如果发表的话，极易受到攻击。一个由真人实事所塑造的病历，一旦揭开，外表上看来无可厚非，甚或楚楚可怜的人之内在的暧昧，将使此人冒上残忍的被误解的危险。佛洛伊德在他的序言中，费了一大部分篇幅为该病历的出版，而非为该病历内容本身的好处作辩，故该序言中大部分现在已无啥意义。在真理与艺术的名义下，我们不管读者的兴趣多下流，欣赏素养多差劲，也要出版任何刊物。试想即使素富盛名的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的出版物，除了赋有文学兴趣或修养的人以外，有几人真会阅读或欣赏呢？

目前，一般作者拥有的不是读者，而是市场。佛洛伊德的作品，就市场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的话，只是对读者。

杜拉为两性取向的混淆所苦。她潜意识里的女性同性恋

倾向和一丛痛苦的动机连结，只有像佛洛伊德那般精于分析的能手，才能揭其真相。因此，读者才能在无可救药的复杂性里，窥知杜拉窘境的全貌。那复杂性就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中，佛洛伊德的天才并非简化它而是将它明了化。表面上，该论文的结构容易探索，对那女孩的生活背景和症状——神经性的咳嗽、慢性衰竭以及其他痛苦，先有一个介绍性摘要；其后两章集中对她的梦的解析；最后一章是结论。在此简单架构下，失了线索的迷宫渐为一种精心设计的佈局所替代，帮助我们了解那影响着杜拉的远近事件的发展，这是种高层次的文学及分析的天才。的确，这两种天才的融合成了佛氏作品独具风格的必备条件。直叙法只会歪曲佛洛伊德所要刻画的真相；即或直线式的风格多么细腻，也捕捉不了他要发掘的神秘与慑人的因果关系。在完成杜拉病历后二十年，佛氏在另一妇人的病例报告中指出：“平铺直叙诚非描写复杂心灵过程的一项有效方法。”因此，杜拉这一病例报告，虽然是一种史，但与一般小说或历史不同。显然，就在这点佛氏改变了小说与历史的写法。我们可在“反罗马式”或乔埃斯、吴尔芙等人意识流的表现法中，看到突破传统直叙式的努力。史学家未能即时向佛氏看齐，以致佛氏对历史写作的影响仍很有限；除了将增加一个人物因素所引起的症状与社会现象的核对表，而列入历史动因的目录以外，史学家并未能效法佛氏放弃直线式写法，以开启历史写作重新架构的可能性。

这个病例，经由特殊的佈局与对杜拉的潜抑欲望的多重透视与分析，即使做为一种新史学写作方式的习作，其灿烂的光彩仍然夺目。杜拉对自己内在潜抑的内容大多不知，佛氏逼她反观过去，深入地横断各种层面，超越她自圆其说的

掩饰外壳，一直进到她和母亲、父亲、哥哥、女家庭教师，其他女孩以及那有名的夫妇：K先生与K女士的关系。当迷惑的读者后来看到K女士的秘密而恍然大悟时，我想他一定要承认很少见过这般精彩的侦探小说了。

杜拉的病并不是由某一个罪魁引起；不是她自己、她的父亲、也不是她所爱的K先生，或她所爱的K女士。没有害人者，只有被害者，这是佛氏病例故事的特征。在他的世界里，天真无邪的人与狡猾世故的人同样地可恶。佛氏所要解除的，正是无邪者与作恶者间不幸的关系——其下策者使那关系世故化，上策者使那关系完全取消。

接下去是佛洛伊德象杜拉的父亲所雇用的精明侦探一般，去捕捉她受难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故事；而且，更进一步捕捉她父亲以及其他牵连者和她的关系。那失常的女孩有一个失常的父亲，他有一个失常的女友，该女友有一个失常的丈夫，而该丈夫引诱那病女孩当情人。杜拉并不希望维持这不迷人的圈圈——虽然佛氏指出她非维持不可。她的不满是另一个问题，在这论文后面我将再讨论。我的看法是所有其他牵连者也都是病例，而可以说是杜拉病例的注解。然而，除了一小部分外，佛氏却不得过问他们，并且，佛氏接受这种不可得性，而不去做严格的学理探讨。他对杜拉的全盘解释，以及他要说服杜拉讨论自己的性生活所作的努力，全局限在杜拉本身的病例上。虽然，事实上佛氏有理由指出毛病并非出于杜拉，而系出于她生活的“环境”——(Milieu)上，这是精神分析治疗所受到的限制。佛氏和其正统继承人，由于对他所服务的伦理学的严酷忠诚，皆未能检视其所受限制的领域。“环境治疗”(milieu therapy)势必牵涉一文化上的革

命。

佛氏因自己的治疗能力，以及格于医生与病人间的限制，以致影响了他教导病人的途径。无疑的，他在从事于一项相当于解析的教导工作。在别处他说到有关“解析……一特别重要的理论”，非常能接近病人本身对问题的观点。解析牵涉教导，此二者在治疗者与病人之间的战斗无法分开。因为治疗者渐深入病人心理而努力要改变它。在这病例中，杜拉拒绝改变她的心理状态，并突然退出，以否定佛氏对他的分析所发掘的事实。这并非杜拉本人对自己的透视不正确，只是那无益于治疗。佛氏并不对所有的真理感兴趣；也不是杜拉所说的真理，除非它们妨碍他自己的操作。因杜拉对自己的透视是她病的一部分，佛洛伊德必须击退它们，以免她抗拒他的透视。她的真理不见得在治疗上有用处；甚至就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出的意義层面而言——在他了解宗教信仰者的“高级的幸福”，可以缓和或克制他们的“低级的幸福”时——杜拉的思想习惯并未带给她“高级的幸福”。诚然，她受到从高级和低级引来的不幸。她的智力及想像力使她变成一个炼炉中，大大小小受害者里的主角。最后，由于破坏了用来保护她的病——并且也是她病的一部分的道德律，杜拉乃对佛氏报复：在他完成对她的病的全部解析前，结束她的治疗。

其实，佛氏的透视要比杜拉自己的高明。她对自己的透视只有使得她得不偿失，而佛氏致力于她的生命的治疗，已显示出它使杜拉克服一些症状的效果。她自己对生命的了解，无论如何不能赋予她以改变命运的力量。此力量正是佛氏对真理的试金石，因此，佛氏的真理优于杜拉的。（此处所谓

真理系指相对的)但是，人性的奥秘在它从不完全投降，甚至对最伟大的专家。人性动机里较原始的部分，除非经由检查，否则不管“投降”具多大治疗意义，也绝不向理性低头。何况，理性所赖的动机本身也未见得合理，因此，理性的力量从根本上被严重限制了，佛氏以多于理性的东西，达到不仅是消除症状的效果。精神分析的经验不仅是以事实为对象的理性操作，而且是种人生态度的转化。就后者言，精神分析的病历跨越了描写文学与想像文学之间的人为障碍。佛氏的病历是科学或是艺术并不紧要，他的解析科学本身事实上就是种艺术，其目标在使被解析者的生命转变。这种人道解析的策略，不管是否为艺术、科学、或宗教，其特征在于它们的转化功能。因此，任何科学或艺术的没落，可由其转化效能的减弱与否测定。依此类推，宗教会变成心理症(Neurosis)，而精神治疗学也会变成以绝望的虔诚为特征的宗教。将来我们该以一种能表达动机的复杂性的方式，写一本现代精神治疗学的历史。

佛氏的病历详细记载的动机内容，远超过病人感性或知性上的能力。诚然，用来区别治疗者和病人的，即是应付动机复杂性的能力。因此，这病历蕴藏着一种智力的战斗。当现代灵魂的侦探面对他的当事人时，他必须象谢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般随机应变。“现在，”佛洛伊德几乎以一种福尔摩斯开始侦查一个案件时，惯用的语气对杜拉说：“我希望你仔细注意自己所说的话。”于是一场智慧的斗争开始：佛洛伊德一一对付聪明的杜拉，潜意识里用来保卫她目前病症的防御工事，以免受其干扰，因为在探究之下，病人的病症将显得更尖锐了。

佛氏的足智多谋可从这病历的要处一目了然，当然，他之所以足智多谋，与他在处理杜拉病例时的心灵，和其内在经验之相互融合有关。佛氏的科学知识是非常接近人性的，他先把自己比为病人，这是他所获得的成就。杜拉痛恨任何接近她的人——包括她自己。佛洛伊德的工作是去拨除她的愤怒，而代以一种被了解的生命本能，这是佛氏透过自我分析所领悟的。

治疗者与病人间情绪上的战斗，必须以智性的形式进行。治疗者对自己的情绪具备控制经验，而病人则缺乏经验与方法。杜拉对自己的情绪缺乏真正的了解，就象所有心理症的病例一样，这种失败可说是“有意的”。同时，这也显示一种智力上的失败；对这聪明可爱的十八岁女孩，这两种失败必须同时获解救。首先透过转移关系，使杜拉转移她的感情到佛氏身上，以便他建立一种权威；其次，透过解析作用，使杜拉看清自己如何残忍地欺骗了自己。为支援这场智力战，佛氏的智慧有时得残忍些，杜拉对自己的不幸总提出与佛氏相反的道理，佛氏则提出批评，或暂停争论，而反问病人：“那么，现在你的记忆对这个怎么说？”

人常不敢面对自己本身的问题。当杜拉象其他经不起分析的病人一般，以强硬态度抗拒佛氏的解析时，佛氏反而更能深入探究，杜拉的聪明并不全是导致争论之因。佛氏的穿梭自如的治疗之网，并不光为早熟的杜拉所织，这是佛氏素喜治疗慧黠而越轨病人的治疗术的特色，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多少具备他这种理性，否则成不了真正的分析家。然而，理性也可导入歧途，就如它可以导入真理。就杜拉的病而言，种种指向她心理症的线索，显示了一种有关的事件：即杜拉

对K先生之性挑逗的不反应性。妙得很，佛氏跟随着错综动机的背后，到达杜拉心理上一个痛苦的结，发现她虽然拒绝，可是她确曾接受K先生的引诱，后来她明白而强烈地排斥它。杜拉爱着她所痛恨的男人。“在潜意识里我们从未发现到一个‘不’字”。性的冷感，象其他形式的排斥般，可能是不诚实的情绪，对抗欲望的一种意识上的防卫性战术。否决作用对佛氏而言，纯然是种“心理学上”的事实。否定意味着跟随在失望后的重新估计。杜拉曾经对K先生失望，K先生的引诱字眼过去已经用过，她知道他只爱她。然而，因为“否决判断”只是潜抑作用的“理性替身”，每一个否定遂肯定了病人的“不”，反而证实分析者所推敲的。因此，当佛氏的解析“碰到杜拉最强烈的否定”时，他乃考虑，这“不”正好证实一个潜抑经验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如果这“不”不是一个公正判断的表示，则“不”即意指期待着的“是”。而且，如果分析工作继续下去，证据不久就会出现。假如病人没有公正判断的能力，治疗者有权忽略病人的否定，而对其联想内容有正面的看法。如果病人说：“也许你认为我想要说不客气的话，但我决无此意；”或“梦中的妇女并不是我的母亲。”分析者乃可以下结论：“是的，她的的确想说不客气的话。”“是的，那是她的母亲。”

怀疑所厌恶的，将能消除该厌恶。我们该留意所有带着强烈厌恶感的病例，留意他们所鄙视或他们所嫌弃的。格维得克氏（Geory Grodduk）写道：“你不会错的，如果你断言：一个男人曾爱过他所恨的，而且仍旧爱着；他曾经且继续仰慕着他所责备的人；他曾经贪婪地想得到那现在使他厌恶的。”但是，如果认为所有的嫌恶都与真情相反，就如同认为所有

的嫌恶，都可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接受一般地错误。排斥作用是超我（Super-ego）的主要活动。而超我并非一种潜在性、软弱而缺乏它自己的本能来源的东西。去揭发隐藏在“排斥”背后的“接受”，也就是对人性本善的不信任。

“怀疑我们的厌恶”这原则是个简单的智慧。由于人类社会经验的影响，在潜意识里，原始的“是”所统治的范围几靠近同样原始的“不”的领域。“不”不断地侵占那原始的“是”的领土。道德上的理由可能带有性的声彩，杜拉有许多好的理由拒绝K先生。也许，在她十四岁时，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追求者，但她缺乏自信，同时，也没有勇气去享受一个毕竟是她父亲女友丈夫的爱。而这种处境使她对感情最深的对象——K女士产生认同作用，如此用佛氏的话说，她的拒绝更是病态了。可能她也发现K先生并非佛氏所相信的那么迷人。K先生在杜拉和她父亲间的一场最复杂的口角中，占着一席地位，佛氏高估了K先生的外表价值，他在这场迷宫中所看到的，是这少女对那迷人的男人的引诱无动于衷。即使假设K先生如佛氏所说般迷人，他到底是属于杜拉所反感的老一辈，她变成老一辈可悲的游戏中的玩偶，她的合作是必要的，它为活在没有爱的世界中的他们挽救一些性爱。然而，游戏太复杂了，杜拉拒绝玩下去。如果她能够免于自己的困恼（指心理症），她也用不着玩那游戏，因为性爱的放纵是心理症的一种形式。在她父母亲的圈子里没有爱情存在，她对K先生的排斥，不管如何暧昧，总是一种踏出圈子的努力。由于心理症过多的排斥作用，佛氏的解析令她的心理症变成一种受伤了的自尊心。但要紧的，他从未将人生在爱情或工作上的好恶，与心理症的排斥作用搞混。没有一

种精神分析的公式可用以区别这种不同，每一位分析家必须找寻其分界，分清每一病例接受与排斥的复杂形式。

做为一个治疗者，佛氏必须怀疑杜拉对爱情游戏的不满，它们已令她够难堪了。她还不够大，也不够嫩，以致她不能因有人给予，她就接受。佛氏忽略了她的年轻，以及年轻之火如何痛苦地在内部燃烧，杜拉陷在一场半是生命，半是爱情的，属于她父亲和K女士的猜谜游戏中。她反对被拖入，然而，另一面，她却为之着迷而想参加。如此一来，聪明的杜拉有一度认为自己被交到K先生——她的一个中年追求者手里，做为容忍她父亲与K女士来往的代价。

当然，佛氏知道杜拉是对的。他赞赏她对这复杂而悲哀的戏中戏的解析，但他反击回去，对她错综的动机加入他自己的复杂解析。这是他的错误；这一点是佛氏精神分析必须越过的，越过个别的病人，而考虑戏里所有不佳演员的动机的整个纠葛——包括父亲、女友、准爱人和笨拙的母亲，这分析至此方为完善。

佛氏因为时间以及仅能分析一个病人，而非整个有关人群的双重限制，使他的分析工作离谱。他的灵机动得迅速正确，事实也马上令他得悉，杜拉的情欲在各种可能层次上都有：她爱她的父亲、K先生；以及最深层次：她父亲的女友——K女士。佛氏称第三者乃是“她的精神生活中最强烈的潜意识活动”，因此活动是不公开的，却也是最有势力的。杜拉不服这种看法，她痛恨K女士，而佛氏却坚持此观，他曾提出事实证明，且略带胜利地报告，他如何用解析制服杜拉，驳倒杜拉，直到她“不再争辩”为止。（那时她已暗下决心要离开）这些事实虽无法得见，但佛氏的多重分析，精确地突破